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本土气质与理论自觉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相关研究评析*

叶方兴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保持适度的平衡已成为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大公圩河蟹产业发展的社会学阐释》一书探索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共生和互利共赢机制,既把握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进发的一般性原理,又突出了环境治理的本土社会实践经验。本文以该书和相关研究话题为素材,就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与地方性知识、该书所探讨的产业转型背后的人水关系以及微型社会学的系统应用等问题展开分析。

关键词: 环境社会学;生态养殖;产业转型;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6)01-0097-06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共生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突出特征。郑杭生先生曾将中国现代化的特征归结为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共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況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应对并不容易”^[1]。这其中的代价就包括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污染问题。近些年来,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出现,特别是太湖蓝藻事件的爆发给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保持适度的平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如果将这个问题放置于城乡转型的社会背景中又会显得越发复杂,因为这其中包含了经济与环境、工业与农业、城与乡之间的多重纠结。在该问题上,河海大学陈涛副教授的《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大公圩河蟹产业发展的社会学阐释》^[2]一书(以下简称《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安徽省当涂县大公圩的河蟹养殖业为例,运用

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河蟹产业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及其效应为基本线索,从适用技术、组织体系、生态资本和民间实践等维度分析河蟹产业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揭示产业转型引发的社会文化效应,总结并探讨其借鉴价值。该书旨在探索产业转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共生、互利共赢机制,既把握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进发的一般性原理,又突出环境治理的本土社会实践经验。本文以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及相关话题为线索,就该书和环境社会学当前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如果套用吉登斯的观点,环境社会学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后果”。人类社会现代性的展现不只是进步、成就、发展、增长,还伴随着贫困、战争、暴力、污染等各种社会问题。尽管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环境问题才真正成为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甚至能够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发达国家在

* 【收稿日期】2015-12-20

【作者简介】叶方兴(1986-)男,安徽舒城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当代社会理论。

工业化过程中曾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事件,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呼吁环境保护的作品,环境社会学也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相比较美国、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我国的环境社会学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与中国社会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历程同步。最近十多年来,环境社会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整体上讲,这种发展还是粗放型的扩张,是一种初步的发展。就发展的质量而言还有很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不足就是理论基础非常薄弱,现有的理论研究还不足以有力地支撑一门新兴分支学科”^[3]。理论准备不足和不够是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中的突出问题^[4]。洪大用教授在沿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郑杭生先生的“理论自觉”之后,提出了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应需要“理论自觉”,其基本任务主要有三:“一是要弄清楚已有的理论,真正吃透它们;二是小心地运用理论,避免生搬硬套;三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觉推动理论创新”^[3]。

应该说,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环境问题乃至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系统、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脱离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与深入分析,就很难真正地理论的高度去把握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个过程不是单纯的认知过程,它还离不开研究者本人对生活实践的感知、体验和领悟,每个研究者都需要自身以“在场”的状态投入到研究之中。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社会现代性与环境问题之间内在关系,提供解决环境问题的本土化方案。这至少包含了如下几重规定性:一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自觉认知,即研究者应该自觉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位置以及寻求最为恰当的认识与评价当代中国社会的方式;二是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逻辑,把握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机制;三是不断探索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实践经验,梳理、归纳、提炼具有代表性的范例,最终将其系统化、理论化。

在环境社会学的经验探索方面,河海大学陈阿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做出了扎实的本土化探索。他在《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癌症村”调查》等系列著作中对水污染和环境健康的社会文化机制做过系统研究,揭示了域外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的张力,堪称这一领域的研究典范^[5-6]。陈涛师从陈阿江教授,不仅延续了他的研究范式与路径,而且研究视域更为开阔。陈阿江教授的水污染系列研究主要关注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问题,未能触及农业领域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农业的生态转型问题。诚如《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所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目前仍然集中在工业污染领域,而农业领域的生态问题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关注”^{[2]11}。在笔者看来,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大国,农业领域的环境问题及其生态化转型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最能切合本土语境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该书绽放出的浓郁的乡土气质。

当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在农村领域体现得最为突出。社会转型中的“三农”问题浓缩了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等多重矛盾,农业发展既免不了来自现代工业化的侵袭,又不能完全地褪去本有的乡土色调。在“工”与“农”、“城”与“乡”的纠结中,农业领域的环境问题并非像城市工业化的环境问题那样“单纯”。所以,从选题上看,《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关注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农村淡水养殖业作为观测点,能够真切地把握住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集中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盲点。尽管该书以大公圩为例,但并不局限于特定地域,而是以点带面、“窥斑见豹”地把握中国社会。从对“小社区”的深入研究中透视“大社会”,探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般机制,“力图探究具体产业转型背后的类型学意义和方法论价值”^{[2]27}。在实践层面,水产领域的成功经验已经反映到当地的工业发展理念中,例如,当地政府借鉴生态养殖模式提出了从“大招商”到“招大商”转型以及由“大办工业”向“办大工业”转型的发展思路^[7]。

可以说,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背后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敏感把握。只有真正立足现

阶段的基本国情、社情、民情,扎根于中国的现代性实践,真切把握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才能够寻求理论研究的真问题。近年来,环境社会学界在此开展了积极探索,《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也就此展开了积极尝试和努力。该书从社会学视角关注产业转型是“基于生态系统严重恶化的现实”^{[2]1},他以小见大,从“大公圩”管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揭示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探索良性的环境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该书基本的理论旨趣是“基于本土经验研究基础的理论建构”^{[2]17},这种理论建构的努力是走向“理论自觉”的尝试。该书在对农村精英生态实践过程的考察中建构了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2]136-147}的分析框架;在生态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效应方面建构了“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2]148-152}的分析框架;在技术社会适应性分析方面对农业从业者老龄化、妇女化和低文化等社会文化特征^{[2]72}的概括,可以看出其努力的方向。当然,这主要是基于经验研究基础上的凝练与概括,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本土理论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更多的学人围绕中国环境问题实践开展更为深入和扎实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来说,要真正地“理论自觉”,就必须在把握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寻找到可咨“解剖”的经典范例,揭示其中规律性、原理性的经验,最终上升为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

二、人水关系：“大养蟹”与“养大蟹”背后的社会问题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养蟹产业的不同境遇对比,揭示环境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该书对大公圩河蟹发展的历史阶段做出梳理,将其发展轨迹描述为“斜N形”四个阶段:“大养蟹”期、“寒流期”、“养大蟹”期、“养好蟹”期。其中,“大养蟹”时期对养蟹带来的冲击最大,“大养蟹”粗放养殖、不注重水域环境保护,最终导致了河蟹产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陷入低迷的恶性后果。而到了2000年之后的“养大蟹”时期,河蟹养殖与环境保护实现了互利共生的良性局面,主要是采用了“种草、投螺、稀养、配养、调

水”的生态养殖实践。

“大养蟹”和“养大蟹”是书中两个形象的说法,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产业发展理念和模式。前者是产业转型之前粗放式的产业模式,以工具理性、市场利益为取向,不去计较可能产生的生态破坏等问题;而后者是考虑水资源保护与河蟹产业发展双赢的生态养殖模式。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养殖理念不仅导致了经济效益的差异,更是造成了水域生态系统失衡。河蟹产业对水环境的依赖性相当高。河蟹“寒流期”与背后的水污染问题密切相关,作者在分析原因时指出了“苗种问题、高密度放养问题、长期粗放型养殖问题以及水污染问题”,其中,水污染引起了经济与环境的双重恶果。“高密度放养和粗放型养殖,直接导致水域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当时本来能够直接饮用的水,转眼间变成了污水,最好的水质也只能达到IV类,大部分区域都是V类水。水污染后,不仅直接导致河蟹大量死亡,也造成河蟹品质和规格大大下降,从而影响了市场价格和经济效益”^{[2]40}。

从“大养蟹”到“养大蟹”,产业转型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改良,是人水关系由“不谐”走向“和谐”的过程。《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要追问的恰恰就是河蟹产业运行的社会文化机制。河蟹生态养殖业是如何转型、如何发展起来的?“生态型的‘养大蟹’模式是何以形成的?从粗放型产业到生态型产业的转型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机理?”这些构成了该书的问题意识。

这样的发问隐含了作者的一个基本预设:产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河蟹养殖是高度依赖水的产业,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河蟹产业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良好的水环境在生态养殖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生态养殖和水环境之间形成了“以水养蟹,以蟹保水”的互利共生格局。水污染问题并非简单地归结为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水污染的主体是人,是人类不当的利用造成水资源的破坏。而任何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基于某种特定的心态实施污染行为的。此外,传统的历史心理也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环境的背后总是体现出特定的社会背景、主体的心理

态度以及历史文化传统。

在揭示引起水质变坏的原因时,《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认为其中的根源在于人为的养殖方式不当。在养蟹业的“寒流期”,养殖水域污染严重,水生物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养殖户亏损严重,河蟹产业萎靡导致集体经济收入下滑。其中的原因,不少人都认为是蟹种出了问题。但该书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蟹种短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当地人“竭泽而渔”式捕捞的必然后果,根源在于人。蟹种问题只是低谷期的最重要的直接成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是人为操作的结果,是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环境意识低下所致。这里的分析将养蟹业的“寒流期”以及水污染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心理。

可以说,水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始终批判“大养蟹”的粗放式经营,这种不计较环境后果的发展方式只会引起“竭泽而渔”的毁灭式的后果。在河蟹养殖产业中,人与水之间钩织了一个共生、互利的生态系统,人水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养蟹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果。不过,人水关系和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方式。“养大蟹”时期的生态模式正是把握了人水关系的有机关系。根据生态学原理,在水域中形成了以河蟹为核心的复合生态系统。其核心做法“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等都是旨在转变传统的养殖模式,并通过养殖模式的转变实现人水和谐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

实际上,我们从《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可以看出,水污染的社会性在农业社会背景下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方式。工业污染往往以工业排污的方式形成,而农业污染主要由不当的农业生产实践所致。书中谈论水质变差时,主要从蟹农们的养殖方式寻找原因,这充分说明农业社会背景下水污染社会成因的特殊性。在熟人为主的农业社会,由于水资源自生的生态平衡能力以及污染物的简单化及其易降解的特质,加之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自律,传统社会中的水污染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值得特别关注问题。所以,尽管传

统社会存在着水污染,但那只是偶发的、个别的现象,如小孩淘气向水源撒尿、扔废弃物等。而到了社会转型期,农村产业转型必然受到城市化、工业化的侵袭,不仅出现了工业污染向城市转移现象,而且不当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环境恶化。

三、“微型社会学”的系统运用

从方法论上说,《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社会学的路径进入到大公圩的河蟹养殖产业转型中,建构了“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解释框架。这套解释框架认为,大公圩养蟹产业自身形成了相对自足的社会子系统,“在大公圩这样的地域范围内,生态产业影响所及人群所构成的有联系的整体性社会。这里受影响的人群既包括生态养殖户,也包括河蟹公司、渔业协会、合作社这样的个人集合体或社会组织。在这样的整体性社会中,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民间社会制度、亚文化以及受影响人的观念、知识结构的变化,是以河蟹产业为媒介而产生的,河蟹产业成为社会子系统运行的核心”^{[2][15]}。

这一方法论直接得益于社会学家在项目研究时提炼出的“项目社会”。项目社会是在某一领域内,由项目影响所及人群所构成的社会,项目使相关人群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以便观测到项目对人群、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的影响。在笔者看来,“项目社会”背后的方法论是微型社会学。微型社会学将调研地域、对象、情境视为微型社会系统,以小见大,用解剖麻雀的方式揭示出社会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就曾以开弦弓村为个案展开微型社会学的尝试,将江村看作是一个微型社会,具体而细微地描述它的生存与运行状态,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理。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安徽省当涂县的大公圩河蟹产业作为观测点,也颇有代表性。大公圩位于长江中下游,河网密集,属于传统的农业区,居民大多以河蟹养殖为主要收入来源。当涂的河蟹远近闻名,当涂县是全国水产大县和河蟹养殖重点县,并形成了生态养殖的“当涂模式”。大公圩是“当涂模式”的发源地,享有“皖南第一粮

仓”的美誉。大公圩养殖产业围绕河蟹养殖形成了“蟹天蟹地”的地域社会,“一个以河蟹产业为媒介、深受河蟹产业发展影响甚至依赖河蟹产业发展的地域社会”^{[2]6}。这种封闭的、自足的地域社会,首先源于圩田自身的特征,“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圩田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系统,也是一个水利共同体和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此外,围绕河蟹养殖也形成了人工养殖、规模化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市场流通、水产品加工、外贸出口和休闲观光在内的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从技术适用、组织体系、生态资本、民间实践四个角度揭示了大公圩地域社会的社会互动。在技术适用方面,专家系统与普通蟹农之间在行动逻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专家系统、技术指导员系统通过“自上而下”知识普及和科技示范户系统横向的知识“扩散”方式实现信息、资源、技术的相互支持。养殖技术致使大公圩“地域社会”出现群体分化,蟹农中既有科技示范户,也包含了普通养殖户。但养殖技术的适用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水平密不可分,在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产业转型过程中,新的养殖技术的采用功不可没,生态技术的推广、适用“根源于对技术受众的社会文化特征的准确把握”^{[2]74}。政府部门通过加强和高校及科研院所水产专家的合作,对水产养殖中的问题和出路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民间精英如“养蟹能手”进行了技术试验,尝试了新型养殖方法,并探索出了新型的生态养殖模式。他们用自己的术语,用押韵的、琅琅上口的顺口溜、歌谣等形式转化了复杂的原理,充分实现了技术推广尊重、植根于本土化并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

在组织体系方面,河蟹产业组织经历了“集体化—去集体化(原子化)—组织化”的变迁,组织化成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重要渠道。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为河蟹生态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机制方面的保障。生态养蟹产业的出现也使当地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生态与经济效益。作者运用了“生态资本”的概念,用来反映生态养殖模式中生态条件的系统效益。“生态

资本的成功运作不仅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是生态产业得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2]100}。民间社会的实践和探索,民间精英对生态养殖模式的认知和探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民间的智慧,经历了“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的转型,这不是精英个体的行为,而是群体智慧。这种智慧植根于当地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性。“生态养殖精英在水乡生活特别是在与水生动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习得了很多的知识和能力,这是其早期社会化的历史遗产。他们生活在水乡,从小就喜欢捉鱼摸虾,对当地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外观、生长周期、生活习性以及生长条件等都非常熟悉”^{[2]131}。“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以河蟹生产为中心建构起系统的关系网络,河蟹产业影响到大公圩这个地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习性。河蟹产业影响人的知识、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影响社会结构、社区生产生活、民间社会制度、亚文化等。河蟹养殖对于日渐空心化的农村社会来说,留住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资源,留住了一大批拥有知识、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农业文化精英和技术精英,并围绕河蟹产业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

四、地方性知识与学科关照

养蟹定位“基于本土经验研究基础的理论建构”,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社会学独有的问题语境和问题意识,强烈的本土关怀是本书的一大特征。套用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说法,环境社会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任何环境问题总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呈现出具体的、独特的社会效应。在社会学遭遇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把握和利用好环境社会学的“地方性”是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走向国际的重大历史使命。

环境社会学需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这里的普遍性是指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环境问题所呈现的共有特征和规律,而特殊性则是指中国环境问题独特的问题逻辑与表现形式。在处理两者之间关系时,一方面,应当体现对人类环境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吸取与借鉴,体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另一方面,应该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注重对中国环境问题内在机制的揭示,发掘可以推广的本土化经验。因此,在处理“域外理论”、“域外经验”与“本土理论”、“本土经验”四者之间关系时应该保持合理的尺度,既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也要表达人类共有的情怀。

从来源上来说,“地方性知识”并非仅仅是现成、现时的,而是扎根在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大公圩”的河蟹产业古已有之,当地人们的文化习性、行为方式、交往习惯等社会文化特征并非是一朝一夕练就的,而是它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延续。“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8]。刘擎在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时,也指出“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思维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部分”^[9]。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本质上是历史与现实的复调式的结合。“地方性知识”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传统,是社会历史文化传承的当下呈现。

在历史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当下呈现中,“地方性知识”总是伴随人类生存实践体验。也就是说,地方性知识包含了人类克服生存困境所做的种种实践活动。在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不仅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做出的探索是社会学创生的重要动力。大公圩的蟹农中出现了一大批的民间精英,他们最终的生产转型成功与自己不断探索新型养蟹模式密切相关。当地民众熟悉当地情况,根据自己的认知方式、文化涵养、思维习性理解技术知识,自然能够因地制宜地找准对策。大公圩的这种地方性知识源于本土经验的实践探索,也推动了产业的生态化转型。《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在这方面开展了探索性分析,但还没有充分满足读者的“胃口”,深度仍有待加强。

此外,环境社会学的地方性知识总是人在场的知识形态。人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应始终处于

“在场”的位置。人既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又是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人与环境、人与水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这意味着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应该进入到人的世界,融入人们的体验、体悟。在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层面,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特别是“地域社会”中的“当地人”,是我们理解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向导,是我们获取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参与者。而当地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价值观、思维方式、情绪体验也都成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内容。

可见,“地方性知识”植根于特定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本土化的生产生活实践,并反映民众社会文化心理,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实践性、主体性。今后,学界还需要以更加鲜明的研究旨趣与科学的研究方法推进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探索出环境社会学“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机制。

参考文献:

- [1]郑杭生.改革开放 30 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J].社会科学研究,2008(4):1-9.
- [2]陈涛.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大公圩河蟹产业发展的社会学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3]洪大用.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109-116.
- [4]洪大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J].学海,2010(2):57-59.
- [5]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6]陈阿江.“癌症村”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7]陈涛.1978 年以来县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以当涂县为个案[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9-25.
-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9:60.
- [9]刘擎.中国有多特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3-14.

(下转第 114 页)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s

JIANG Hailing^{1,2}, WANG Lei², WANG Jining², MA Baichao²

(1.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viewed as a bridge to connect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application".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of state strategic import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s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draws the common ground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On that basis, we can get the enlightenment that Chin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performance index system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ompetitive and non-competitive fund utilization assess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hould contain positioning as well as organization mode and system. We should also build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China's context.

Key words: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dex system

【责任编辑:周丽娟】

(上接第 102 页)

Indigenous Temperament and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omments on Social Logic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levant Research*

YE Fangxi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Maintaining of a proper 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book named the *social logic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on the crab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Dagongwei* explor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mechanism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not only hold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is book and related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 the issues on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local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behin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system application of micro sociology probed in this book.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cological cultiv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ocal knowledge

【责任编辑:章 诚】